

殖民地台灣における近代教育の鏡像 1930年代台湾の教育と社会

殖民地的臺灣近代教育
鏡像

——一九三〇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

許佩賢

著

◎

吳密察

推薦

ACRO
POLIS
衛城
出版

植民地
台湾における
近代教育
の鏡像

一九三〇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 ◎ 許佩賢 著



島嶼新書

21

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
一九三〇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修訂版)

作者——許佩賢

總編輯——莊瑞琳

責任編輯——李晏甄

封面設計——井十二設計研究室

排版——藍天圖物宣字社

社長——郭重興

發行人兼出版總監——曾大福

出版——衛城出版

發行——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二三四一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一〇八一號九樓

電話——〇二一三二一八一四一七

傳真——〇二一八六六七一〇六五

客服專線——〇八〇〇一二二〇三九

法律顧問——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刷——盈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二刷——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定價——四〇〇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一九三〇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 / 許佩賢著—初版

—新北市：衛城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15.12

面；公分（島嶼新書：21）

ISBN 978-986-90476-9-2(平裝)

1.教育史 2.臺灣史 3.日據時期

520.933

103017612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衛城

EMAIL acropolis@bookrep.com.tw

BLOG www.acropolis.pixnet.net/blo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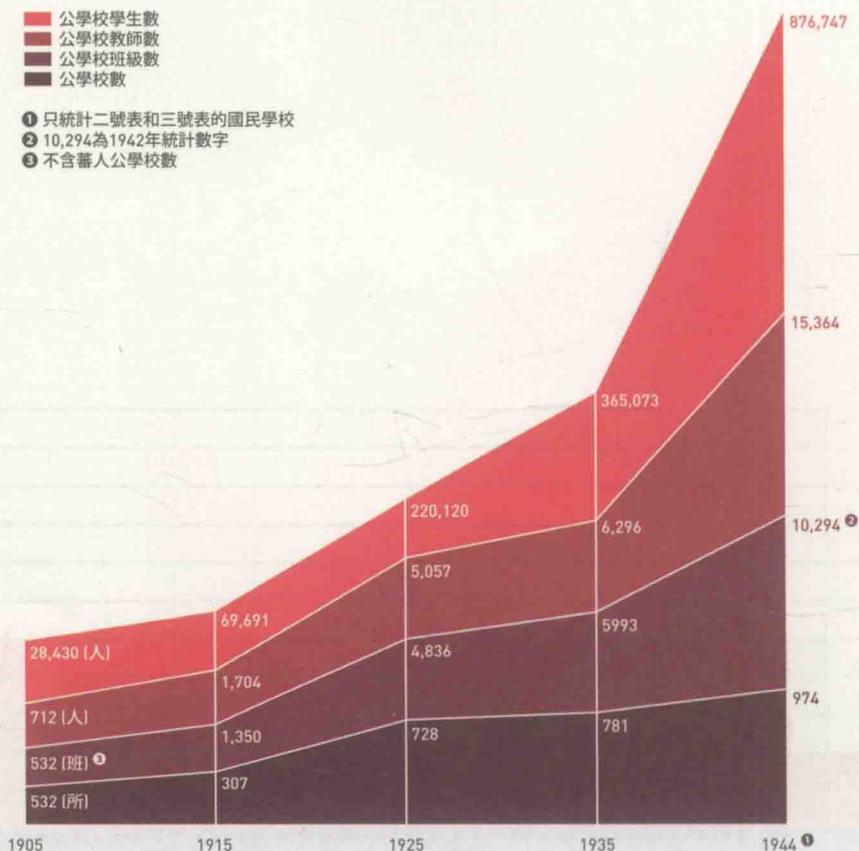
FACEBOOK <http://zh-tw.facebook.com/acropolispublish>



填寫本書線上回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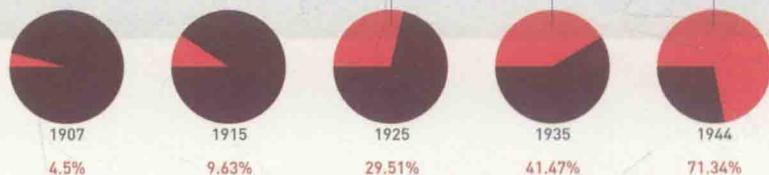
- 公學校學生數
- 公學校教師數
- 公學校班級數
- 公學校數

- ① 只統計二號表和三號表的國民學校
- ② 10,294為1942年統計數字
- ③ 不含蕃人公學校數



- 公學校學生數
- 公學校數

男生就學率: 44.26% 男生就學率: 56.83% 男生就學率: 80.86%
 女生就學率: 13.25% 女生就學率: 25.13% 女生就學率: 60.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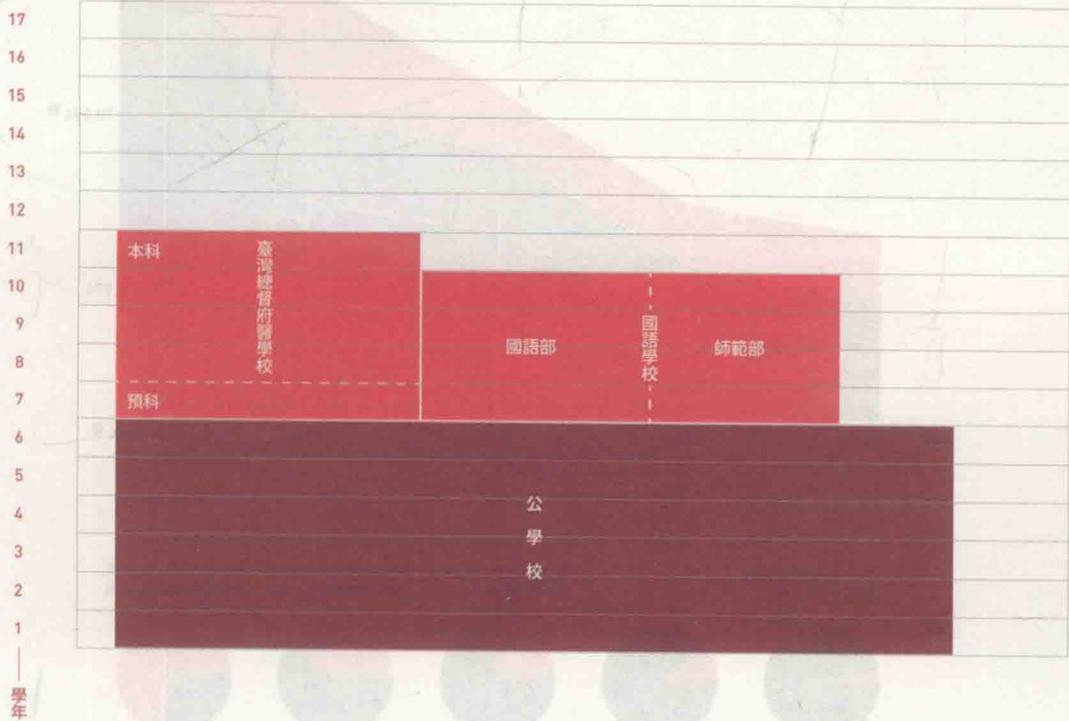


學齡兒童就學率

日本時代公學校各項統計資料

臺灣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在日本統治20年後的1915年，也不到10%；即便到了1935年，也還沒超過50%。女生的就學率尤其低，至日本統治40年後的1935年，也還不過25%。公學校的就學率、學生數、班級數都在1935年以後有大幅增加。由本圖可以看到1930年代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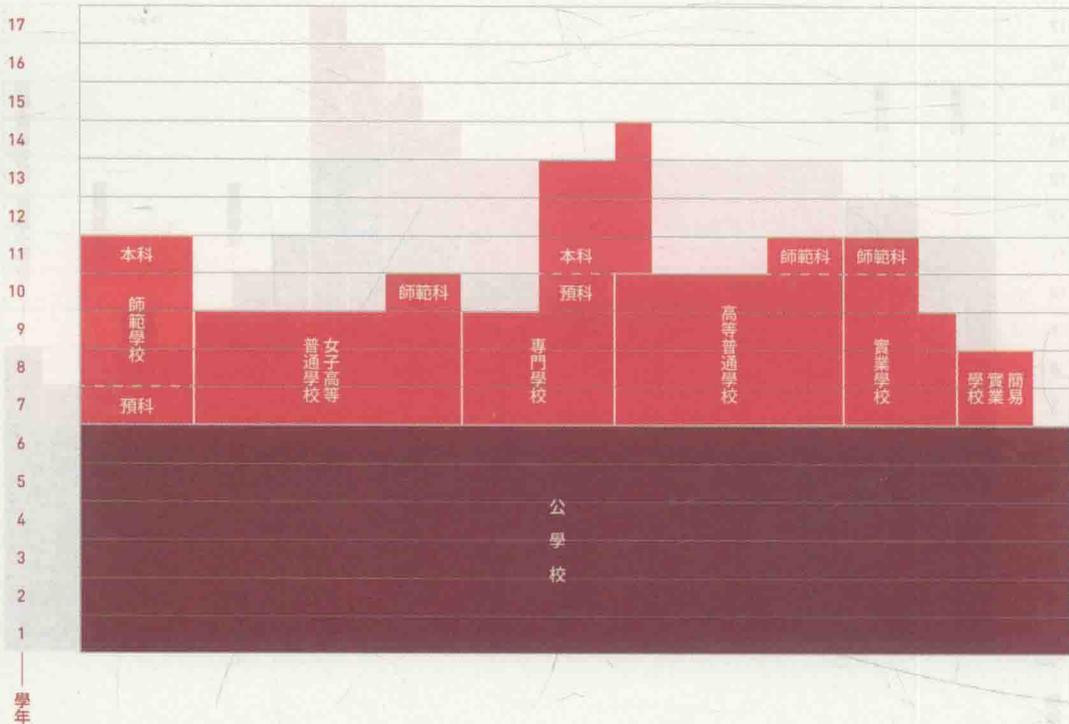
圖表製作 — 蔡偉娟



1919年以前臺灣人適用的學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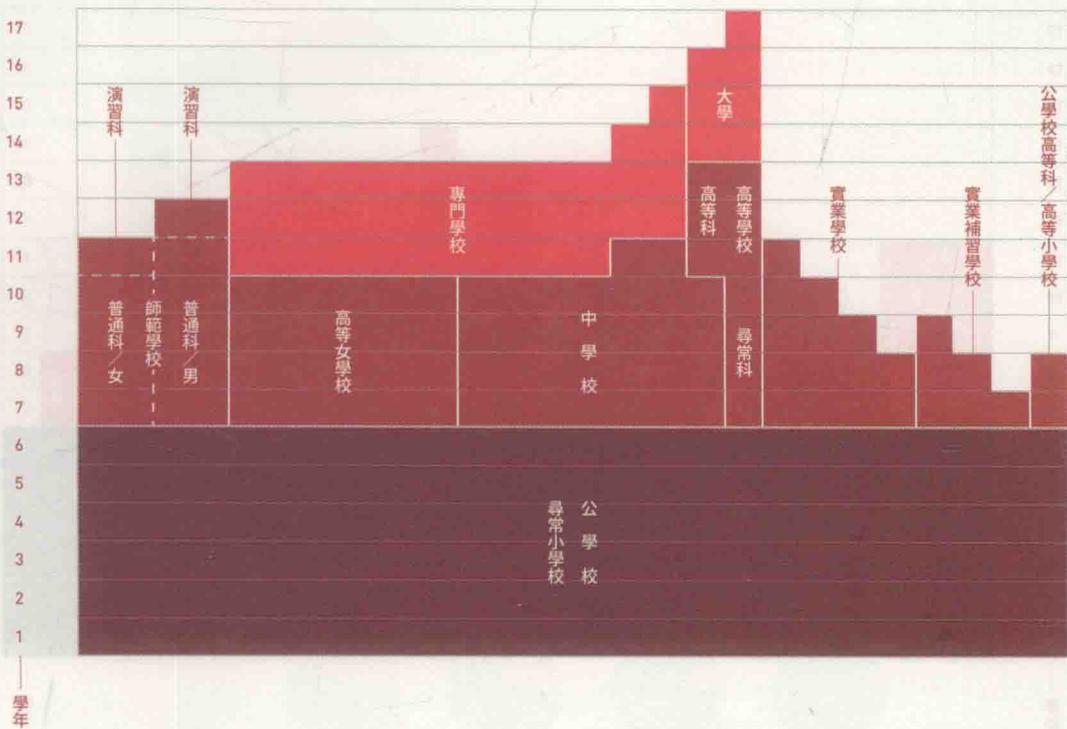
日本領臺第二年(1896年), 隨即在臺灣設立國語學校及國語傳習所。國語學校主要分為師範部及國語部, 師範部顧名思義, 是為了培養初等教育師資而設立; 國語部則相當於臺灣人的中等教育機構, 臺日人均可就讀, 初成立時為四年制。國語傳習所於1898年改制為公學校, 為臺灣人就讀的初等教育機關。1899年設立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目的是培養臺灣籍醫生, 初成立時為五年制。對臺灣總督府來說, 短期訓練的本地醫生, 可以協助改善衛生, 減少傳染病, 是眼前臺灣統治的重要課題; 而短期訓練的本地教師, 可以協助奠定基礎教育, 宣傳國家意識形態。不論是醫生或教師, 都可以說是臺灣總督府遂行臺灣統治的棋子。然而, 對臺灣社會來說, 公學校畢業後升學醫學校或國語學校, 如同新科舉, 是社會上升的管道。

圖表製作 —— 蔡偉娟



1919年《臺灣教育令》下的學制

1910年代以後，臺灣士紳開始要求更多教育機會，1915年成立四年制的臺中中學校，為首次臺灣人可以升學的普通中等教育機關。受到臺灣社會強烈教育欲求的刺激，1919年日本政府以勅令公布《臺灣教育令》，規範在臺灣的臺灣人教育，也就是只針對臺灣人而制定的法令，所有學校都是「日臺別學」。這個教育令最大的突破是，對臺灣人開放部分中等教育機關。在六年的公學校之上，分別設置了高等普通學校（男子就讀，四年制）及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女子就讀，三年制），也設置了職業教育體系的實業學校（四年制）及簡易實業學校（二年制）。醫學校升格為七年制的專門學校，國語學校改為師範學校，年限也延長一年。但僅三年的時間，日本政府因國內外諸多問題，殖民地政策轉為內地延長主義，這個「日臺別學」的教育令便不再適用。



1922年《新臺灣教育令》下的學制

1922年在內地延長主義的政策原則下，日本政府重新公布新的《臺灣教育令》，此教育令最大的特色在於中等以上學校「日臺共學」。從初、中、高等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門教育，至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在臺灣也完成完整的學校體系，各階段學制與日本本國的學制幾乎完全一致。初等教育階段，雖然仍保留公學校與小學校之別，但不再以民族別來區分就讀學校，而是以「常用國語」與否來區別。從法的規定來看，新教育令體現了「內臺一致」的原則，有平等的外貌，但實際上，在「日臺共學」的規定下，原本臺灣人就讀的中等學校也招收日本學生，且為數不少，然而原本日本人就讀的學校，雖然名義上也招收臺灣學生，但人數極為有限，總的來說，臺灣人的就學機會反而縮小了。

圖表製作—— 蔡偉娟

資料來源—— 教育部

推薦序

一九三〇年代臺灣教育史研究的方法與意義

吳密察（臺大歷史系兼任教授）

許佩賢教授將她近幾年來的研究論文彙編成一本書，即將要出版，要我為她這本書寫一篇序。

這本書收錄之文章所處理的問題相當分歧，如果要在其中找到一個共同點，那麼應該可以說它們的時間重點都放在一九三〇年代後半葉，甚至一九四〇年代初期，也就是日本時代的最末階段。

這個時期的教育，不論是「國民學校」制度、教育義務化，甚至大幅增設小學以上的中級學校，都被戰後所承襲，成為戰後教育的基礎。就此意義來說，這些日本殖民時代末期的教育史研究，就成將臺灣教育史從日本殖民時代架橋到戰後的重要關鍵。附帶一提，本書作者關注的另一個年代，是日本殖民時代初期，也就是臺灣建立近代教育之創始時期，如果將之與清末的臺灣教育情況相對照，一樣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認為她的教育史研究，雖然也企圖關照社會史的側面，但是因為日本時代的教育是殖民政府挾著強大的行政力量，因應國家之需要而展開的，因此她的研究還是建立在「精準地掌握制度史」的前提之上。作者對於日本殖民時代之教育的這種認識，基本上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制度史還是日本殖民時代臺灣教育史研究的基礎。其實，這種情況即使延伸到戰後也是如此。蓋臺灣近代教育，

大幅度地依賴國家興辦的官式教育，舉凡制度、內容、經費，都高度仰賴於政府，受到政府強力規範。

日本時代末期的臺灣教育，雖然在質量上都有很大的發展，但是既有的理解卻相對零碎。眾所周知，日本時代臺灣教育制度史之入門書《臺灣教育沿革誌》（一九三九），記載的內容相對詳細平實，如果能夠對此書進行詮釋性地解讀，不失為理解日本時代教育史的捷徑。但此書的記載止於一九三七年，日本時代最後十年間的教育史就無法依賴它了。由於既往沒有體系性的彙編性著作，因此日本時代末期的教育史研究（其實，其他領域的研究也大致相同），便必須從最基本的史料蒐集與甄別開始。

一九四〇年代，時局瞬息萬變，制度更革頻繁，在戰爭情況下也難以從容製作、保存史料，因此如今的研究者必須投入更多精力於蒐集、甄別史料。在這方面，作者向我們展現了她深厚的史料功力。舉凡官報、法令集、統計書、年報、報紙、期刊、私人回憶錄，都成為她進行研究的史料根據，而且還及時網羅了近年來不斷「出土」的日記、學校檔案、政府檔案。例如，作者即使在以前就曾針對一九四三年日本殖民政府於臺灣實施義務教育，做過初步的研究，但因為日本外務省《茗荷谷文書》的公開，使她得以再次撰寫收錄於本書的〈日治末期義務教育與國民學校制度的展開〉（第八章）。

利用政府決定政策之過程中所產生的檔案，尤其是當初提供給政策決定者參考的各種文件和會議紀錄，便可以深入理解政策的意圖與決策的「政治」。我本人也曾經利用日本的《樞密院文書》，

研究日本殖民時代中期的臺灣教育史（從日本殖民的教育學制發展看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收入《臺灣近代史研究》。本書作者對於一九四三年臺灣實施義務教育的研究，也可說是使用了兼及制度史與政治史的研究手法。

如同上文所述，本書處理的問題相當分歧，而且有一些文章還是在新史料「出土」之後才又重新深化既有的研究所得，因此建議讀者不妨將它與作者的另一本著作《殖民地臺灣的近代教育》（臺北：遠流出版社，二〇〇五）併讀。相信這樣便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本書的主張及其貢獻。

二〇一五·九·十六

目次

推薦序 一九三〇年代臺灣教育史研究的方法與意義 吳密察

導論

第一部 臺灣民眾的教育期望

第1章 公學校教師的發達之路及其限制

第2章 公學校畢業生的社會史意義

第3章 實業補習學校的成立與臺灣社會的教育欲求

第4章 「愛鄉心」與「愛國心」的交錯

第二部 殖民政府的教育總動員

第5章 戰爭時期的臺灣教育會

第6章 做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

第7章 戰爭時期的身體動員與健民運動

第8章 日治末期義務教育與國民學校制度的展開

附錄

臺灣近代教育大事與社會政治事件對照年表

參考書目

索引

399 370 362 342 287 257 207 177 175 145 105 075 021 019 001 i

表目次

表 0-1	一九三〇年代各級學校數及學生數成長狀況	009
表 1-1	張式穀簡歷（日治時期）	026
表 1-2	各年度日、臺籍酒類經銷商人數變化	055
表 2-1	宜蘭公學校歷屆畢業生職業分布分類表	082
表 2-2	宜蘭公學校畢業生職業分布	083
表 2-3	宜蘭公學校畢業生升學及各類職業比例	085
表 3-1	龍潭農業專修學校各學年學科課程及每週教授時數	116
表 3-2	龍潭農業專修學校學生及畢業生概況	117
表 3-3	嘉義商工補習學校學生及畢業生概況	122
表 3-4	嘉義家政女學校學生及畢業生概況	126
表 3-5	公學校畢業生島內的升學管道及人數（一九二五—一九四四）	129
表 4-1	一九三〇年代鄉土調查·鄉土讀本一覽	161
表 4-2	「鄉土的歷史」調查項目	163
表 5-1	臺灣教育會會員數及《臺灣教育》發行量（一九三七—一九四二）	181
表 5-2	《臺灣教育》作者群分析（一九三八—一九四二）	188
表 5-3	《臺灣教育》收錄論文內容類別表（一九三八—一九四二）	190
表 5-4	公學校教師一日生活作息	197

圖目次

表 6-1	全臺灣收音機體操大會一覽	227
表 8-1	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四年學齡兒童就學率及入學適齡兒童就學率	313
表 8-2	特設國語講習所在學者年齡別（一九四一年四月二日）	314
表 8-3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四年公學校及班級增加情形	315
表 8-4	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四年初等教育機關在學臺灣人學生人數統計	315
表 8-5	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八年國民學校教員需給計畫	317
表 8-6	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二年國庫補助初等教育費	318
表 8-7	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八年國庫補助初等教育費預定額	319

圖 1-1 新竹市街商工會議所分台示意圖

047

附錄目次

附錄一	一九三五年新竹市街的臺灣人有力者	343
附錄二	宜蘭郡公學校本科及高等科兒童畢業後狀況統計表（一九二六—一九四〇）	347
附錄三	一九三四年宜蘭公學校畢業生名簿	349
附錄四	日治時期實業補習學校一覽表	351
附錄五	收音機體操相關年表	357
附錄六	「戰爭時期臺灣教育關係文書」——第一〇四卷有關義務教育制度的內容	361

導論

我研究臺灣教育史，一方面是出於對臺灣當代社會、特別是教育議題的關心，另一方面則是教育史的研究對經歷過殖民統治的臺灣，特別有意義。

早期我關心的是殖民政府如何透過教育進行控制，塑造適合殖民地統治的人民，也就是「做為統治技術的教育史」。然而，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究竟在什麼程度上，能有效達到目的？殖民地的人們，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與期待進入學校體系？他們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可以接受或不接受殖民者所設定的教育目標或規訓？甚至在什麼條件下，得以反過來利用教育體制，達成個人成就？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我開始關心教育政策與教育制度以外的學校生活、個人心性與行動，思考近代教育對臺灣社會的意義，也就是從社會史的角度考察教育史。在這樣的問題關心上，我從不同的視角考察「個人」、「教育」、「社會」與「國家」的關係，一方面究明殖民地統治之本質與原理，同時也觀照殖民地人民的自覺與選擇。

本書關注的是一九三〇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不同於過去的教育史研究，多集中在近代學校體系初創的日治初期、臺灣知識分子可以發聲的一九二〇年代，以及戰爭時期的皇民化教育，本書選擇以一九三〇年代為考察對象，因為一九三〇年代正是臺灣社會教育需求大爆發的時期，也是殖

民政府開始教育總動員的時期。一九三〇年代，就學率明顯提升、學校大幅擴張、戰時動員正要啟動，然而，我們對於這個時期的瞭解卻相當有限，為了讓讀者瞭解一九三〇年代在臺灣教育制度史的位置，以下先介紹日本統治臺灣以來，近代教育制度發展的軌跡。

日治時期臺灣近代教育的發展

日本領有臺灣以後，逐步引進近代學校制度，最後構築了自小學經中學、高等學校到大學的升學體系。雖然學制與戰後略有不同，但是像升官圖一樣的學制階梯，時間到了進小學讀書，接著依照每個人的狀況，或繼續一階一階地往上升學，或停在某一階梯，取得某一級學校的文憑，畢業進入社會工作，仍然成為其後一百多年來臺灣人的共同經驗。

日治時期的教育體系，並不是一開始就有這樣完整的學制規畫，而是隨著殖民政府的統治需要以及臺灣社會的變化，慢慢成形。日本領有臺灣之後，來臺灣擔任第一任學務部長（相當於教育部長）的人叫做伊澤修二（一八五二—一九一七，一八九五—一八九七在任）。伊澤修二對新領土教育的構想，來自於他對國民教育的理念，他特別重視國語（日文）的力量，認為透過教育，可以從人心最深處把臺灣「日本化」。因此，伊澤一上任，就在臺北設置國語學校（也就是後來的師範學校），培養國語教育的師資；另外還在全臺各地設置國語傳習所，一方面快速培養通曉國語的行政人員，另一方面也為長久的教育計畫預作準備。一八九七年，伊澤提出「公學校」的構想，計劃把

國語傳習所改成小學科六年、中學科四年的公學校。在公學校中，除了保留臺灣私塾教授的儒家經典之外，也教授日文、地理、歷史、算術、理科等有用的學問。

但是，伊澤的構想在現實上遇到很大的問題。一八九七年臺灣總督府的預算大幅縮減，教育費用緊縮，伊澤也被解職。一八九八年日本政府頒布了《臺灣公學校令》，雖然沿用了伊澤提出的公學校之名，但是做法、精神與伊澤的構想卻有很大出入。一八九八年成立的公學校，只是六年小學的程度，沒有設置中學科；而且以前的國語傳習所是由政府支付學校經費，但是「公學校令」規定公學校設置及維持所需的經費，除了教師的薪水之外，全部由地方民眾負擔。唯一和伊澤構想接近的是，公學校最主要的上課內容是國語。

後藤新平（一八五七—一九二九）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時（一八九八—一九〇四在任），曾公開說臺灣的教育沒有一定方針，唯有教授國語是唯一的方針，後來被廣泛引用為日治初期的「無方針主義」。但事實上，並不是真的無方針，日本的殖民地教育方針非常明確，就是要透過殖民地教育培養適合殖民統治的「新人類」——具有基本讀寫能力、健康的身體以及認同勤勉、守時等道德規範，並且擁有愛國思想。對殖民統治者來說，透過初等教育機關的公學校，來培養這種「新人類」，恰到好處，既能使殖民地人民得到基本的訓練與教化，又不用擔心殖民地青年擁有過多知識，養成批判殖民統治的思考能力，或成為高級遊民（指有相當學歷，卻找不到相應工作的人）。

因此，日本統治的前二十年，殖民地臺灣的臺灣人教育以初等教育的公學校為主，加上少數非正式的職業教育機關。在公學校之上，除了醫學校及國語學校之外，並沒有中等普通教育機關可以

升學；而醫學校與國語學校，都是因應殖民統治的衛生與教育需求而設置。雖然如此，臺灣社會卻很機敏地認識到，新式學校是新文明的代理者、新的社會上升管道。因此，在臺灣總督府規範的遊戲規則下，臺灣民眾敏捷地爭取教育機會，甚至到了總督府的學務官僚也不得不正視的地步。¹

一九一一年從朝鮮總督府轉任臺灣總督府學務部長的隈本繁吉（一八七三—一九五二，一九一—一九一九年在任）很敏銳地注意到，臺灣社會對教育的欲求極高，家長們想盡辦法讓子弟接受更多的教育，積極與官方交涉，自願捐款、捐地、蓋校舍。他在朝鮮規劃教育制度時，很明白地主張，不需要給殖民地人民過多教育，只要讓他們處於從屬的地位，為殖民母國服務即可。然而，到臺灣之後，他感受到臺灣社會對教育的高度欲求，轉而同意增設學校、有限度地開放中等教育機關，以疏導臺灣社會的教育欲求，並藉以將臺灣青年留在臺灣升學，以防他們到日本留學後，接觸到更自由的環境，導致「思想惡化」，為臺灣總督府的統治帶來更大困擾，也就是將教育做為統治臺灣的安全瓣。在隈本任內，協調各方，成功設立了第一所可以讓臺灣人升學的中等普通教育機關——臺中中學校（一九一五年設立），同時也開始準備制定規範臺灣人教育的基本法令。²

一九一九年發布的《臺灣教育令》，只規定在臺灣的臺灣人之教育。其中規定臺灣人念完六年制的公學校之後，男生可以升學四年制的高等普通學校，另外也新設置臺灣女生可以升學的女子高等普通學校。結果原先的臺中中學校，也改名為臺中高等普通學校。雖然《臺灣教育令》使臺灣人在公學校畢業後，有了中等教育階段的升學管道，然而從名稱到實質的教育內容，都與日本本國的中學校有很大落差。同時，國語學校改為師範學校，招收公學校的畢業生，先讀預科一年，再讀本